

#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 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

北京出版社

# 評《前线》《北京日报》的資產階級立場

戚本禹

北京出版社

1966年

**評《前线》《北京日报》的資產階級立場**

戚本禹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西便胡同34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2·字数：9,000

1966年5月第1版 196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0册

統一書号：3071·216

定價：0.04元

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为这个资料加上了“编者按”。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也以三个多版的篇幅选登了这些资料。声势之大，是这几个报刊创办以来所罕见的。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现在如果能对这些许多毒草进行认真的批判，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现在的这种作法，是不是在认真地批判毒草呢？是不是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呢？不，不是。

你们批判过吴晗吗？

没有。

从一九五九年吴晗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以来，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间共有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没有揭露过吴晗一个字。相反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在这个期间积极发表文章，为吴晗，为吴晗所塑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热烈捧场。“老兄老弟”们那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在

所有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是最不象样子，最恶劣的。

姚文元同志提出吳晗的問題以后，你們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也沒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們对姚文元同志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轉載，不介紹，反而质问上海的同志：“你們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背景就是毛澤东同志经常教导我們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学說，背景就是你們报纸上也登載过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在全国开展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决定。难道进行阶级斗争，还要经过你們批准嗎？难道不经过你們批准，就是沒有党性嗎？看来很清楚，你們所要的党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是资产阶级的党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轉載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时，你們的态度转变了嗎？也沒有。《解放軍报》发表了旗帜鮮明的“編者按”，正确地指出，吳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而《北京日报》的“編者按”，对《海瑞罢官》却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說，这是一出“影响較大的戏”，几年来，大家是“有不同意見的”，“有不同的意見應該展开討論”。其实，你們是支持吳晗，反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前綫》《北京晚报》都不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日报》出来轉載一下，这是装出一副假公正的面孔，来掩盖你們真偏袒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前綫》《北京日报》突然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题目是

《从〈海瑞罢官〉談到“道德继承論”》。好象你們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站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前线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篇同文化革命唱反調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用“小罵大帮忙”的手法，为吳晗保駕。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吳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說成是一种“道德继承”問題。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向阳生的文章里，变成了一个所謂“純学术”問題。

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階級口号，来为吳晗辯护。其实，你們从来是站在资产階級的立場上，包庇吳晗之类的资产階級代表人物，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者。你們对于反动的东西，一直是开放綠灯，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量出籠，而对于批判毒草的文章却一概扣压起来，不准发表，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階級“自由化”，不折不扣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哪里是什么平等呢？

向阳生文章的末尾还装腔作势地要求大家对所謂“道德继承”問題，进行討論，企图为吳晗《海瑞罢官》問題的討論定調子，想把对吳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从尖銳的政治問題轉到所謂“純学术”問題上去。后来人們知道，所謂向阳生者，也就是同吳晗合写反党文章的邓拓。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一次會議上公开宣布“現在並沒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并且說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吳晗的文章一样也有錯誤。

隔了不久，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吳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这是一篇

假檢討、真進攻的文章。《北京日報》在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不加任何按語，不作任何批判，這實際上是支持吳晗以檢討的形式向批評他的同志進行反攻。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章里，吳晗就心照不宣地對向陽生說，你的批評“使我認識了錯誤，改正了自己的觀點”。吳晗完成了反攻任務以後，就按照向陽生定的調子，在《前線》《北京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道德繼承”問題的所謂自我批評，欣然承認自己錯誤的“中心”，是所謂“道德繼承”問題。兩個人密切搭配，一唱一和，演了一場雙簧。

一篇不夠，調子定不下來。你們又接連發表同類性質的文章，一個勁地想把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往所謂“純學術”問題上拉。發表在今年一月八日《北京日報》上的李東石（即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的文章，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拋出來的。這篇文章把吳晗《海瑞罷官》的“指導”思想，說成是一種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同一個《海瑞罷官》，一会儿是所謂“道德繼承論”的產物，一会儿又是某種評價歷史人物觀點的產物，就是不肯說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產物。

眾目睽睽，營私舞弊是不行的。《前線》《北京日報》對吳晗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鬥爭、真保護的手法，迅速為大家識破了。不少報刊發表了揭露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特別是今年四月以來，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一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識分子的面目暴露得越來越清楚了。一種難堪的“將軍”局面擺在支持、包庇吳晗的《前線》《北京日報》《北

京晚报》的面前。于是，你们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作者”，并且重新发表了吴晗过去在《前线》上发表的《赵括和馬謖》，想以此敷衍塞责，欺骗读者。这就是你们对吴晗的所谓“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做重要秘密来介绍，而对于吴晗忠实继承胡适衣钵，甘心充当美国洋奴，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的种种罪恶活动却连一个字都不肯提呢？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

没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sup>①</sup>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助浪，在社会上散放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sup>①</sup> 廖沫沙曾经在一九三四年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的革命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用这句话回敬了廖沫沙，并为自己的杂文集取名《花边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四一、三九七—四〇〇页。



你們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謔”》,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說大話”,“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請問你們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們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辱,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嗎?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梁壁輝(即俞銘璜)同志在《交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論》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們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帐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个遮遮掩掩、欺騙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論〉是錯誤的》。什么“忘記了”“階級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給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象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这样一篇假检讨,当然蒙混不了群众。讀者严肃地对这种假检讨提出了批評,但是无论是《前线》还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不理睬群众这种正当的批評。因为对你們來說,廖沫沙是必須好好加以保护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陣地,是万万退让不得的。

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編者按”似乎

改變了自己以往的腔調，說：“他（指廖沫沙）決不是‘不自覺地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作了幫手’，而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但是，這仍然是一頂空洞的帽子。我們要問這個廖沫沙究竟是幹什麼的？從他一系列反動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是一個為“鬼”張目，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張目，為地、富、反、壞、右張目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是一個跟洋鬼、土鬼結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統一戰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的反動活動事實，你們比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為什麼你們不肯作一點揭發呢？看來你們是直到現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竅。

你們批判過鄧拓嗎？

也沒有。

前幾年，代表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即修正主義分子，在奔騰澎湃的社會主義革命浪潮里掀起了一股逆流。他們利用我們的暫時困難，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鄧拓在這場猖狂的進攻中，是一個重要人物。吳晗、廖沫沙、鄧拓，“三家村”反黨小集團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是鄧拓。我們知道，就是這個鄧拓，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親自出馬，糾集吳晗、廖沫沙，在一個飯店里聚餐，組織起了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店。黑店的名称是他起的，吳南星的化名是他定的，文章的刊登與否是他批的。“三家村”開業的歷史，就是鄧拓率領吳晗、廖沫沙一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文化思想戰線上同無產階級

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右分子林希翎，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林希翎曾经称呼他是中国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邓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失败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职务被党中央撤销了。他被人民“罢”了“官”。在这以后不久，他又钻入了北京市委，重新上台，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颇“懂得”一些斗争的策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惊涛骇浪，使他改换了自己的斗争方式。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广大群众批判、斗争的情景，使他心有余悸。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不再象一九五七年发表右派言论那样赤膊上阵，而是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他凭借《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

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三種諸葛亮》《“偉大的空話”》《“放下即實地”》《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交友待客之道》《陳絳和王耿的案件》《為李三才辯護》《崑崙山人》《宛平大小米》《鄭板橋和“板橋體”》《智謀是可靠的嗎？》《王道和霸道》《馬后炮》《古代的漫畫》《林白水之死》《專治“健忘症”》等，是其中之最甚者。

對所有這些用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的手法，十分惡毒地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毒草，《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過去曾經作過批評沒有？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

特別是那篇極端反動的《專治“健忘症”》，這是一支很惡毒的箭，它的矛頭直接射向我們敬愛的黨中央。他肆無忌憚地攻擊我們敬愛的黨。他要用“狗血”淋我們的“頭部”，要用外國特制的棍棒對着我們的“頭部”打得我們“休克”，以讓他們那些所謂“高明的醫師”，也就是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上台。這一篇瘋狂的反革命雜文，充分暴露了鄧拓這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刻骨地仇恨黨、仇恨人民的黑心腸。

鄧拓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為，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憤慨，他們向《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寫信，提出嚴正的批評。但是，你們對於這樣的批評信都不予刊登，不僅不予刊登，反而千方百計地為鄧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辯護。你們嘴上說的是“百家爭鳴”，實際上行的是資產階級的“一家獨鳴”。就是說，只許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放資本主義之毒，不許工農兵群眾和革命幹部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鏟除你們的毒草。你們實行的完全是資產階

級的独裁，資產階級的專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形势陡起变化。一場新的反击战开始了，邓拓的合作者吴晗被揭露出来了。如果《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真正願意揭露邓拓，这时候，你們仍然有一点主动权，但是你們沒有这样做。非但沒有这样做，而且你們还請邓拓做报告、写文章，支持、包庇吴晗。

客觀的階級斗争是不以人們主觀的意志为轉移的。斗争不断深入。吴晗、廖沫沙、邓拓联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完全明朗化了。广大的讀者对《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評的作法极端不滿，憤憤不平，盖子非揭不可了。这时候，你們为了摆脱被动挨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才匆匆忙忙地把邓拓的問題提了出来。

提出邓拓問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邓拓等人，这种說法岂不自相矛盾？不，并不矛盾。

三个多月以前，《前线》《北京日报》不是就曾經为了保护吴晗，而积极发表了向阳生“批評”吴晗的文章嗎？提出邓拓的問題，不过是这种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丑剧的重演。

《前线》《北京日报》在“編者按”里，极力回避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問題。“三家村”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的“編者按”里却占了最次要的地位。吴晗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将”，而邓拓却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轻重倒置，掩盖要害，牺牲車馬，保存将帅，这就是《前线》《北京日报》在保护邓拓問題上玩弄的一套手法。

《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批判”邓拓的資料，同样不提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問題。占了两个版面的《燕山夜話》摘要，只在最后用两个平淡不引人注意的小标题，提了一下邓拓的“以古諷今”問題。邓拓那些恶意攻击党，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动言論，那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被罢官、貶官鳴冤叫屈也是为他自己的被罢官、貶官鳴冤叫屈的文章，都被《前线》《北京日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庸俗无聊”，“孤芳自赏”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今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日报》又散发了一份“关于批判《燕山夜話》的参考选题”，说什么“邓拓是艺术上的复古派”，“站在古人的楼台上”，“宣传艺术越古越好”，继续为邓拓打掩护，企图引导讀者把对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到“崇古师古”的方向上去。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輿論准备的政治要害問題沒有了。

这能叫做“批判”嗎？把它叫做掩盖錯誤、包庇坏人、欺騙讀者，不是更符合实际嗎？

《前线》《北京日报》的“編者按”說：“在这一場斗争中，我們得到的教訓是很深刻的。过去由于我們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

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們的‘自由市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沒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場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

这能叫做自我批評嗎？

“教訓是很深刻的”。什么教訓呢？

“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真是放松了嗎？

“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被別人乘虚而入嗎？真是被別人利用了嗎？

“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沒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那末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在挂帅呢？

“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一點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嗎？

“以致在这一場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丧失立场嗎？是丧失警惕嗎？

统统不是。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問題。你們这个陣地，不是无阶级的陣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陣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

的大門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抹胭脂搽粉，是遮盖不住丑陋的面孔的。你们过去放了那么多毒，出了那么多牛鬼蛇神，又要了那么多恶劣手法来抗拒文化革命，今天用几句空话，就能向读者交代过去吗？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到了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是谁积极支持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邓拓、吴晗、



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遭到革命群众反击以后，是誰用各种办法包庇邓拓、吴晗、廖沫沙呢？后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問題包不住了，又是誰指使你們玩弄那一套“牺牲車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所有这些問題，你們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們不揭发，群众要揭发，你們不批判，群众要批判。我們相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編輯部一切願意革命的同志，一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举起毛澤东思想紅旗，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和批判你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应当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把一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下台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們应该看到，还会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登台表演。不同的是他們的表演方式会经常变花样，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則比較隐蔽，有时分散出击，有时集中进攻。我們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坚决地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用毛澤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籠、未出籠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爬虫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